



哲学史家文库

第2辑

# 戴震哲学研究

张立文著

人  
文  
社

出版社

*A Series of Books by the Historian of Philosophy*

哲学史家文库

第2辑

戴震哲学研究

张立文著

*Series of Books by the Historian of Philosophy*



人  
民  
大  
学  
出  
版  
社

社

编辑主持:方国根

责任编辑:段海宝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戴震哲学研究/张立文 著. 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4.9

(哲学史家文库·第2辑)

ISBN 978-7-01-013220-4

I. ①戴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戴震(1723~1777)-哲学思想-研究

IV. ①B249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6899 号



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 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15.25

字数:240 千字 印数:0,001-2,000 册

ISBN 978-7-01-013220-4 定价:3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 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## 自序

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若跨出庐山再观山，也许会看得清晰一些。戴震对当时理学的审视，就有这么一点“跨出”的精神，因而能看得更透彻一些。

从历史上看，大凡真正掌握了时代精神的学者，往往不被当时人所认识和理解，特别不被掌握了权力的统治者所理解。戴震满腹经纶，或考据，或义理，或天文，或地理，或算术，或思想，各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大家，尚且如此穷困潦倒，清淡度日；即使是被戴震所批判的程颐、朱熹等，虽在戴震时被定为官方哲学，然其本人在世时，又何尝被理解？孔文仲奏称：程颐“污下儻巧，素无乡行，经筵陈说，僭横忘分，遍谒贵臣，历造台谏，腾口问乱，以偿恩仇，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。请放还田里，以示典刑”<sup>①</sup>。范致虚又奏言：“程颐以邪说诐行，惑乱众听”，事下河南亦体究，尽逐学徒，复隶党籍”<sup>②</sup>。如果程颐被作为“元祐奸党”中一员的话，那么，朱熹则被作为“伪学逆党籍”中的重要思想领袖。胡纮上言：“比年以来，伪学猖獗，图而不轨，动摇上皇，诋诬圣德，几至大乱。”<sup>③</sup>沈继祖遂论：“熹剽窃张载、程颐之绪余，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，簧鼓后进，张浮驾诞，私立品题，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，潜形匿迹，如鬼如魅。乞加少正卯之诛，以为欺君罔世、污行盗名者之戒。其徒蔡元定，佐熹为妖，乞编管别州。”诏朱熹落职，罢祠，窜元定于道州。“选人余嘉上书，乞斩熹以绝伪学”<sup>④</sup>。这些政治批判的帽子，足以吓死人的。迫使朱熹的门徒“更名他师，过门不入，甚至变易衣冠，

① 《伊川先生年谱》，《伊洛渊源录》卷4，《朱子遗书》，吕氏宝诰党重刻白鹿洞原本。

② 黄宗羲：《伊川学案》，《宋元学案》卷15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。

③ 冯琦编：《道学崇黜》，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80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874页。

④ 以上见冯琦编：《道学崇黜》，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80，第875页。

狎游市肆，以自别其非党”<sup>①</sup>。历来是把学术思想当作政治来批判的，而统治者对于学术思想的害怕程度，也可想而知。就是朱熹死后的葬礼，统治者也很害怕借机“闹事”，而不放心。因此右正言施康年上言：“‘四方伪徒期会，送伪师之葬，会聚之间，非妄谈时人短长，则缪议时政得失，望令守臣约束。’从之”<sup>②</sup>。无非是限制朱熹的学生、友好在送葬时谈论“时人短长”和“时政得失”而已。倘若“时人”无短，“时政”无失，又怕什么“妄谈”和“缪议”？假如有短、有失，又何谓“妄谈”和“缪议”？

曾几何时，被作为“邪说诐行”、“伪学逆党”、“诋诬圣德”、“惑乱众听”的异端邪说，“污下儉巧”、“欺君罔世”、“图为不轨”、“几至大乱”的大逆污行，随着沧桑的逝去，翻身一变，而成为“圣贤之蕴”、“爱君忧国”、“官方哲学”、“统治思想”。元代，程朱道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，“非程朱之学，不试于有司”<sup>③</sup>；“设科取士，非朱子之说者不用”<sup>④</sup>。到了明代，科举考试“一宗朱子之书，今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，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”<sup>⑤</sup>。戴铣说：“文公朱熹注释群经及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学》、《庸》子史等书，而后孔子之道既明，而晦者复大昭于世。孔子大圣，朱子大贤，道德事功，不甚相远。”<sup>⑥</sup>汪仲鲁说：“祖述宪章，启迪后贤，以立天地之心，以植生民之命，继往圣之绝学，开万世之太平。”<sup>⑦</sup>程朱道学既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，便影响士子们的读书导向。从乡学到太学，从私塾到书院，“咸尊以为师者，唯朱文公”<sup>⑧</sup>。即使明中叶王学兴起，清代乾嘉汉学盛行，亦未使朱学的正宗地位发生丝毫动摇。以至“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，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”<sup>⑨</sup>。凡有与程朱之学相异者，便成为异端邪说。戴震因为批判程朱，无疑成为“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”，“大为学术人心之害”<sup>⑩</sup>。程朱之学从“异端邪说”到“官方哲学”

① 脱脱等撰：《朱熹传》，《宋史》卷429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12768页。

② 脱脱等撰：《朱熹传》，《宋史》卷429，第12768页。另见《道学崇黜》，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80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877页。

③ 《赵鼎祠堂记》，《圭斋集》卷5。

④ 《儒林一》，《上饶县志》卷19。

⑤ 《东林列传》卷2。

⑥ 《优崇儒先祠嗣疏》，《婺源县志》卷64。

⑦ 《重修文公家庙记》，《婺源县志》卷66。

⑧ 袁桷：《邓山书院记》，《清容集》卷18。

⑨ 朱彝尊：《道传录序》，《曝书亭记》。

⑩ 方东树：《汉学商兑》。

的变迁,一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,“亿万世一定之规”<sup>①</sup>,其他思想又成为“异端邪说”。孔子说:“知变化之道者,其如神之所为乎!”<sup>②</sup>认识这个变化的道理,对于提高人类理论思维水平是有裨益的。

戴震的哲学批判是一种寻根究底的思考,他对于对象性理论的前提能否成立以及如何成立的考察,体现了哲学思考所具有的自由精神。因此,戴震对程、朱所建构的形而上学本体论——理哲学,陆、王所建构的形而上学本体论——心哲学的考察,就是这样一种考察。戴震虽在形式上继承了张载到王廷相、王夫之的气学,但他认为张氏与二王的基本思想理路和思维方式,是承袭程、朱、陆、王的,作为理学三派之一的气学派(或称客观理派),也是在追求世界万物终极本原或终极根据中,建构他们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。王廷相、王夫之只不过是把被程朱、陆王颠倒了的理—气和心—物关系,重新颠倒过来,使理在气先,理生气的头足倒置,修正为“理为气之理”,“理寓气中”。这种正过来的工作,当然,具有非常重要意义,但并没突破理学的思想理路和思维方式。

戴震认为,宋明理学三派的思想理路和思维方式,基本上是沿着周敦颐的《太极图》及《太极图说》而展开和演化的。因此,戴震的哲学批判必须改变由《太极图》开启的宋明理学的思想理路和思维方式<sup>③</sup>,这就是他所宣布的“发狂打破宋儒家中《太极图》”的义蕴所在。这个打破的重要贡献所在,就是否定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哲学。戴震对于世界的盘诘、万物根据的思考,不是倾心于对于事物原因或万物本原的求索,孜孜于哲学逻辑结构最高范畴的寻求,以及热衷于建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,而是把事物原因、万物本原、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,看作是一个气化流行、生生不息的过程,戴震把这个过程称为“道”,因为“道”就是“行”的意思。既然是“行”,那就是无终了或终极,永远是一个进行的过程。

戴震对于宋明理学程朱派形而上学本体论——理哲学的批判,以及对于理的理论前提能否成立以及如何成立的考察,便动摇了理学家“以理杀人”

<sup>①</sup> 玄烨:《御制朱子全书序》,《朱子全书》第27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,第845页。

<sup>②</sup> 《系辞上传》,《周易本义》卷3,《四书五经》本,世界书局1936年版。

<sup>③</sup> 参见张立文:《宋明理学研究》第二章“濂学——周敦颐思想研究”,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版,第106—173页。

的基础。“理”之所以能杀人，就是因为“理”是天地、万物的根据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原则、准则。在理学家看来，这个“理”是通过格世界万物之理，即“格物穷理”或“即物穷理”而得到的。格物是一事一事的格，一物一物的格，有一件不格，就缺了一物的道理；一书不读，就缺了一书的道理。这样而穷得的“理”，无疑是客观真理，它既是自然的客观真理，又是社会的客观真理。因而是不能违戾、背离的，否则就是对客观真理的亵渎和叛逆。客观真理是唯一的，它排斥多元论；真理不能与相反的观点同时并存。这就是说，真理与谬误是对立的，客观真理不是谬误，谬误不是客观真理。既是谬误，当然需要克去。所以，存理去谬就是顺理成章的。这里所说的谬误，在理学家或当时统治者看来，就是与程朱道学相背离的异端邪说，也就是与“天理”相对立的“人欲”，按理学家的名言，就是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或存真理，去谬误。这样，“理”就具有唯一性、绝对性和独断性。代表客观真理的“理”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掉、消灭与客观真理相违逆的一切东西，于是理也就可以杀人了！

本书通过戴震生平、思想、逻辑结构、批判精神，来探讨清中期的文化思想动态，以及与宋明理学、乾嘉汉学、近代新学的关系，以明戴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。根据笔者探讨，戴震已建构了有别于宋明理学的新理论，故称之为“戴学”。

借本书出版之机，特向帮助过笔者写作本书的好友，谨致谢忱。

张立文

于 1990 年 4 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自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)          |
| <b>第一章 生平、性格和著作考释 .....</b>     | <b>(1)</b>   |
| 一、求学与明道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1)          |
| 二、“狂者”与“狷者”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0)         |
| 三、痛苦与理解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20)         |
| <b>第二章 形上学本体论的批判——天理论 .....</b> | <b>(33)</b>  |
| 一、打开时代精神奥秘的钥匙 .....             | (34)         |
| 二、形而上本体论的批判 .....               | (42)         |
| 三、形上论的道德论批判 .....               | (51)         |
| <b>第三章 世界图式的建构——天道论 .....</b>   | <b>(59)</b>  |
| 一、天道一性一人道的逻辑结构 .....            | (59)         |
| 二、天道与阴阳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63)         |
| 三、形而上与形而下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86)         |
| 四、分化与整合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101)        |
| <b>第四章 自然生命的关怀——天性论 .....</b>   | <b>(112)</b> |
| 一、人是感性的理性动物 .....               | (112)        |
| 二、性的生成和结构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21)        |
| 三、才与性的关系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34)   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<b>第五章 体情遂欲的理想——人道论</b> | ..... | (140) |
| 一、何谓人道                  | ..... | (140) |
| 二、仁义礼智诚                 | ..... | (148) |
| 三、体情遂欲                  | ..... | (161) |
| 四、以理杀人                  | ..... | (168) |
| <br>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 <b>第六章 火光照物的形式——心知论</b> | ..... | (173) |
| 一、心知与神明                 | ..... | (173) |
| 二、照物与神断                 | ..... | (181) |
| 三、学问与导思                 | ..... | (188) |
| <br>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 <b>第七章 戴学后继和中西之法归一</b>  | ..... | (195) |
| 一、戴学后继                  | ..... | (195) |
| 二、存意开源                  | ..... | (210) |
| <br>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 <b>附录一 戴氏宗谱</b>         | ..... | (215) |
| <b>附录二 戴震年表</b>         | ..... | (219) |
| <b>主要参考书目</b>           | ..... | (226) |
| <b>索    引</b>           | ..... | (231) |

# 第一章 生平、性格和著作考释

戴震，乃徽州之硕学，隆阜之高士。戴震治学，博大精深，通贯古今。于哲学和考据、训诂、音韵及天文、地理、数学、水利等自然科学，无所不及，而成一代哲人，影响深远。

## 一、求学与明道

戴震字慎修，又字东原。生于清雍正元年(1724)<sup>①</sup>，卒于清乾隆四十二年(1777)。安徽徽州府休宁隆阜(今属屯溪市)人。戴氏家族，据洪榜《戴先生行状》记载：“自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曰安，有子曰颜，山饶州乐乎迁歙州”<sup>②</sup>。戴颜葬母于歙州黄墩小练源，颜死后亦葬于休宁隆阜，这样便世代定居于隆阜。戴氏祖先之所以从江西迁到隆阜，是由于该地处横江和率水汇合的冲积盆地。既为农耕宝地，亦是商运码头。“地平阔，势延长，两溪大会，一望平阳”<sup>③</sup>，“溪流一线，小舟如叶，鱼贯尾衔，昼夜不息”<sup>④</sup>，是一个繁衍子孙后代的好地方。

---

① 段玉裁：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载：“先生以十二月己巳，生邑里之居第。”洪榜：《戴先生行状》载：“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。”雍正元年为1723年，依公元计算，为1724年1月19日。

② 据《隆阜戴氏宗谱》载，“自唐银青光禄大夫”之“唐”，系“南唐”。(参见《隆阜戴氏宗谱》，明嘉靖修，康熙抄本。)

③ 《隆阜戴氏宗谱》。

④ 《休宁县志》，道光本。

然而,当戴震出世之时,家境已极困难。“少家贫,无以亲师友”<sup>①</sup>。其父戴弁依靠族人的资助,在江西南丰做小布商。族裔戴琴泉曾载:“公父为族人经营布业于江西之南丰,家素寒,无力购置之本,多向族人假借”<sup>②</sup>。年轻时的戴震,曾随父到南丰行商。明清时代,形成财力雄厚的徽州商人集团,隆阜亦不乏富商大贾。虽为贾,但好儒,这是徽州商人集团的特点。他们重视兴办地方文化教育事业,读书和藏书之风盛行。戴震说:“虽为买者,咸近士风”<sup>③</sup>。因此,文人学士辈出,据统计,徽州各县考中举人,明代为298人,清为698人。明代安徽考中状元9人,徽州独占4人。隆阜戴氏,亦代有学人。

在这种民情士风下,即使“少时家贫,不获亲师”,亦能进塾读书,因为宗族中有人“置塾,教其子弟之贫不获亲师者,俾成其材”<sup>④</sup>。戴震十岁开始读书,便能过目成诵,一日数千言不肯休。擅独立思考。有一次,当老师教授《大学章句》的“右经一章”以后,戴震问:“何以知道这是‘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’?又何以知为‘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’?”老师回答说:“这是朱熹在注释中所说的。”又问:“朱熹是什么时候的人?”答:“南宋时的人。”问:“孔子、曾子什么时候的人?”答:“东周时人。”问:“东周和南宋相隔多少年?”答:“约二千年。”问:“既然相隔二千年,朱熹何以知道是这样的呢?”<sup>⑤</sup>老师无以应。梁启超认为,此段故事,“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”<sup>⑥</sup>。

戴震少年时便有这种求实的精神和求甚解的学风,似与徽州地理社会环境相关。徽州“少平原旷野,依山为居,商贾东西行营于外,以就口食。

<sup>①</sup> 余廷灿:《戴东原先生事略》,《戴震全书》(附录二)第7册,黄山书社1997年版,第23页。

<sup>②</sup> 《戴东原轶事》,《新闻报》1924年2月24日至26日。

<sup>③</sup> 《戴节妇家传》,《戴震文集》卷12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205页。

<sup>④</sup> 《例赠宣武大夫公王墓表》,《戴震文集》卷12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196页。

<sup>⑤</sup> 参见洪榜:《戴先生行状》和段玉裁: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,王昶:《戴东原先生墓志铭》,江藩: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等,均有记载,《戴震全书》(附录二)第7册,黄山书社1997年版。

<sup>⑥</sup> 梁启超: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三年版,第21页。并认为戴震“此种研究精神,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,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,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”。

然山民得山之气，质重矜气节”<sup>①</sup>。既讲求日用实事，又具有朴质性格。戴震曾讲过这样的故事，他的族祖某，不怕鬼，居一僻巷空屋，夜里灯下似有形影，阴惨惨地很是吓人。一巨鬼怒说：“你果真不怕？”便作各种恐怖凶恶的形状，族祖始终说不怕，恶鬼稍和说：“我亦不一定要赶你，只要你说一个怕字，我便走了。”族租发怒说：“我实不怕鬼，怎能说谎，任你所为。”恶鬼太息说：“我三十年来从未见过像你这样性格刚强而不肯低首，怎样与你同居。”鬼就消失了。有人归咎于族祖，说：“畏鬼是人之常情，只要说怕鬼，就可息事宁人。”族租说：“我不是道力很深的人，只能以气凌之，气盛而鬼不逼，稍有牵就，气馁而鬼乘而入。巨恶多方引诱我，幸未中其机巧”<sup>②</sup>。这种笃实刚强的性格，给戴震以熏陶和影响。他一生坎坷，但始终不屈，讲求实事求是功，绝不一日稍怠。

戴震读书，默而好深湛之思。每一个字必求其义，私塾老师略举传、注讲解，他都不满足。老师不胜其烦，便授以近代字书和汉代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，“三年尽得其节目”。又取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及汉儒传、注、笺等，参照考究，尽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虽疏不能尽记，经、注无不能背诵。此时，戴震不过十六七岁。他在 55 岁时，给段玉裁书中回忆说：“仆自十七岁时，有志闻道，谓非求之六经、孔、孟不得，非从事于字义、制度、名物，无由以通其语言。宋儒讥训诂之学，轻语言文字，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，欲登高而无阶梯也。”<sup>③</sup>从文字学而入经学。文字、音韵、训诂是“闻道”的舟楫和阶梯，并非是目的，目的是求索经书中最高的原理“道”。要贯通经书，必须从组成语辞的每个字研究做起。由字的正确理解，才能正确理解辞，而后才能真正理

<sup>①</sup> 《戴节妇家传》，《戴震文集》卷 12，第 205 页。

<sup>②</sup> “戴东原言：其族租某，尝僦僻巷一空宅。久无人居，或言有鬼。某厉声曰：‘吾不畏也。’入夜，果灯下见形，阴惨之气，砭人肌骨。一巨鬼怒叱曰：‘汝果不畏耶？’某应曰：‘然。’遂作种种恶状，良久，又问曰：‘仍不畏耶？’又应曰：‘然。’鬼色稍和，曰：‘吾亦不必定驱汝，怪汝大言耳。汝但言一畏字，吾即去矣。’某怒曰：‘实不畏汝，安可许言畏？任汝所为可矣！’鬼言之再四，某终不答。鬼乃太息曰：‘吾住此三十余年，从未见强顽似汝者。如此蠢物，岂可与同居！’奄然灭矣。或咎之曰：‘畏鬼者常情，非辱也。谬答以畏，可息事宁人。彼此相激，伊于胡底乎？’某曰：‘道力深者，以动静祛魔，吾非其人也。以气凌之，则气盛而鬼不逼；稍有牵就，则气馁而鬼乘之矣。彼多方以饵吾，幸未中其机械也。’论者以其说为然。（参见纪昀：《读阳续录》（五）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 23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，第 534 页。）

<sup>③</sup> 段玉裁：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，《戴震文集》（附录），第 217 页。

解“道”<sup>①</sup>。

字义、制度、名物，都具有客体性，而非单纯的主体称谓。由字组成的辞，也具有客体性；由辞所表达的“道”，亦必具客体性的内容。戴震批评宋儒讥训诂学，轻视语言文字，虽从汉学家（指考据学家）的立场来看，似乎有一定的道理，但从客观来看，亦并非都如此。王安石作《三经新义》，重义理，又有文字学《字说》之作，据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而广之。朱熹作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义理、训诂兼修。然戴震是依当时汉宋之争出发<sup>②</sup>，指宋学的主要倾向而言。

戴震 18 岁时随父客居南丰，“课学童于邵武”<sup>③</sup>。一方面教书，以维持生活；另一方面，发奋读书，“经学益进”<sup>④</sup>。20 岁时，从邵武回到陆阜。并与同郡的郑牧、汪肇龙、程瑤田、方矩、金榜等六七人，请教婺源江永（字慎修）。江永“治经数十年，精于三礼及步算、钟律，声韵、地名沿革、博综淹贯，岿然大师”<sup>⑤</sup>，是国内著名学者，为戴震所倾心崇拜，并把自己的著作请江永指正，亦深得江永的指点和赞赏。戴震的律历声韵之学，便得自江永的启发，为他后来的治学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至于戴震的问学，除江永外，当有程恂和方檠如<sup>⑥</sup>。程恂精于《礼》。戴震问学程恂，应为 20 岁时。程恂戴震作科举文，考科第。他爱护看重戴震，

<sup>①</sup> 戴震尝谓段玉裁曰：“经之至者，道也。所以明道者其辞也，所以成辞者字也。必由字以通其辞，由辞以通其道，乃可得也。”（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，《戴震文集》（附录），第 217 页。）参见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和《古经解钩沉序》两篇，“辞”均作“词”，“辞”、“词”古通。

<sup>②</sup> 余英时指出：“清代的考证学应该远溯至明代晚期的程、朱和陆、王两派的义理之争。由义理之争折入文献考证，即逐渐引道出清代全面整顿儒家经典的运动。”（余英时：《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》，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，龙门书店 1976 年版，第 15 页。）

<sup>③</sup> 段玉裁：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，《戴震文集》（附录），第 217 页。

<sup>④</sup> 洪榜：《戴先生行状》，王昶：《戴东原先生墓志铭》。见《戴震文集》（附录），第 252、261 页。

<sup>⑤</sup> 洪榜：《戴先生行状》，《戴震文集》（附录），第 254 页。至于戴震问师江永的时间，胡适主张在戴震 24 岁以后（参见《戴东原的哲学》，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版）。余英时教授认为，“江戴之间仅为问学关系，而无受业关系。”且两人初识于徽州之紫阳书院，即 28 岁（1750），非 24 岁。（参见余英时：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，第 168 页。）这里仍从洪榜、段玉裁说。

<sup>⑥</sup> 程恂，字栗人，雍正甲辰进士，任北运河同知，授翰林院编修。方檠如，淳安人，是何焯高足，为古文名家，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主讲紫阳书院，戴震常去听讲。

认为“如子者，巍科硕辅，诚不足言”<sup>①</sup>。戴震常称其为“先师”。方檠如为古文名家，对经学造诣很深。他在歙县紫阳书院主讲，戴常去听讲，切磋学问。对于戴震的文章，方檠如深为折服。戴震问学先后，当先程恂，次江永，次方檠如。洪榜《戴先生行状》记载：“日从江先生、方先生，从容质疑问难”<sup>②</sup>。

戴震生活的时代，是“西学东渐”、自然科学得到发展的时候。从明末清初以来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各个方面反思中国传统文化，这种反思具有总结性的特点。从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、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、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，到方中通的《数度衍》、方以智的《物理小识》，写出了一批集大成的多学科的自然科学名著。同时，西方通过耶稣会传教士，把西方近代工业文化带到了中国。如熊三拔刊行的《泰西水法》、《简平仪说》、《表度说》，利玛窦和徐光启等译的欧几里得《几何原本》、《乾坤体义》、《天学初函》等。在数学、几何、天文、地理、机械、医学等领域，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。尽管传教士带来的并非近代最先进的工业文化，但却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挑战。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，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。就当时直观的回应来看，既有如李之藻那样，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中国累世发明所未晰者，主张吸收基督教神学，表示愿从传教士砥焉；亦有如杨光先那样，反对汤若望任钦天监，认为《时宪历》依西洋新法，不合祖宗旧制，主张整国体，诛邪说。方以智无这两种偏弊，而采取分析的态度。一方面他主张向西方学习，另一方面他反对一切照搬。他把西学分为两大类，一是自然科学及其方法，称之为“质测”之学；二是神学世界观和方法论，称之为“通几”之学。他认为西方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，因此，主要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，而不是神学世界观。即使是自然科学，也有不完备的地方，需要分辨。

戴震对待西学的态度，与方以智相似。20岁（1742）的戴震“因西人龙尾车法作《嬴旋车记》，因西人引重法作《自转车记》”<sup>③</sup>。22岁（1744）作成《策算》一卷，段玉裁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作《筹算》，“策”即“筹”。然不曰筹

① 洪榜：《戴先生行状》，《戴震文集》（附录），第254页。

② 洪榜：《戴先生行状》，《戴震文集》（附录），第255页。

③ 凌廷堪：《戴东原先生事略状》。《嬴旋车记》和《自转车记》见《戴震文集》卷7。

而曰策,是“以别于古筹算,不使名称相乱也”<sup>①</sup>。《策算》专介绍乘、除、开平方的方法,列举《易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仪礼注》、《考工记》、《皇极经世》等经史中资于算者二十例,叙述筹算方法、具体步骤及算式。戴震的策算与古筹算之异,既与戴震所处时代有关,西方数学方法通过传教士在中国得以介绍,梅文鼎曾吸收西算方法,而撰《筹算》一书。江永私淑梅,而作《数学》,对戴有启迪;亦与戴震不恪守陈规、善于突破成说的治学态度有涉。《策算》之方法引自西方,而其宗旨却落在发扬中国的传统数学的成就,冀希融会中西。基于此,戴震以西方数学方法为工具,去解决经史中的算术问题。他虽主张学习西方数学方法,但亦持分析扬弃的态度。18世纪的西方数学各分支已逐步形成,并进入微积分时代,而戴震所接触到的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却是中世纪古老的数学方法,它与中国传统数学有相似性,以至有西法出于中法的思想。戴震曾受《几何原本》启发,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,但《策算》却体现了中国传统策算理论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的特色,与西方几何学注重逻辑推理大异其趣。

在这个时期,凡是有眼光、成熟的思想家,都不能无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,而作出相应的回应。但清王朝文化思想上的高压恐怖政策,使知识分子对于政治,噤若寒蝉。清代大兴文字狱,对于有民族民主思想和背离程朱官方哲学的知识分子,大加杀戮,康熙朝后便有庄廷鑨《明史》案、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,以及查嗣庭、吕留良、胡中藻、王锡侯、徐述夔等案。雍正时,谢济世注释《大学》,从《礼记》本,而不从朱熹《四书集注》本,被顺承郡王锡保告发为毁谤程朱,世宗胤禛定性为“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”<sup>②</sup>,而遭处斩。在文字狱中,株连所及,除子孙、门生、故旧外,还有再传弟子、印制、卖书者。屈死、冤死、充军、为奴者,不计其数。这种高压文化思想政策,产生了双向制约:一是顺向性制约,不采取“六经注我,我注六经”的形式,即借六经以发挥微言大义,提出自己的主张,避免被扣上“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”的罪名,而酝酿了考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策算序》,《戴震文集》卷7,第129页。

<sup>②</sup> 《清代文字狱档》,故宫博物院出版。

据学思潮<sup>①</sup>的掀起。一些知识分子钻入故纸堆，皓首穷经，了却一生。二是逆向性制约，不满以程朱官方哲学为经典，为颠扑不破的真理，动辄以违戾程朱思想为罪大恶极，奴役人民。清朝王公大臣，嘴上程朱道学，行上男盗女娼，亦绾纲了批判程朱思潮的端绪。戴震是融这两股思潮于一身，而以适当形式表现出来的杰出人物。

据戴震自谓，17岁就十分注重经典中的字义、制度、名物，加之他博闻强记，23岁（1745）时便作成《六书论》三卷。他认为求义理（“闻道”），必须重语言文字。“自昔儒者，其结发从事，必先小学”<sup>②</sup>。所谓小学，本意是儿童识字而得名，汉代把小学称作“文字之学”<sup>③</sup>，清代小学包括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。他认为“载籍极博，统之不外文字，文字虽广，统之不越六书”，这是因为“六书也者，文字之纲领，而治经之津涉也”<sup>④</sup>。汉人以六书为六种造字法，戴震以六书中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为造字法，转注、假借为用字法，这便是“四体二用”说，与汉人迥异。又以转注就是互训，所谓转注，按汉代许慎的解释是，“建类一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”。然而，后人不解考老为转注。其实“考”与“老”，“属谐声会意者，字之体；引之言转注者，字之用。转注之云，古人以其语言，立为名类，通以今人语言，犹曰互训云尔。转相为注，互相为训，古今语也。《说文》于考字训之曰老也，于老子训之曰考也，是以序

<sup>①</sup> 梁启超曾说：“凡时代非皆有思潮，有思潮之时代，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。其在我国自秦以后，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，则汉之经学，隋唐之佛学，宋及明之理学，清之考据学，四者而已。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三年版，第1页。）梁氏此说，为后人所采用，但仍嫌不足，笔者在《中国近代新学及其发展阶段》一文中分为“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，两汉经学，魏晋玄学，隋唐儒、释、道三家之学，宋明理学，近代新学。”（载《光明日报》1983年1月24日《哲学》专刊）考据学思潮是汉学的延续，足以与上述思潮相区别，而具有时代特色的，可称明清之际为经世致用之学思潮。然在一个时代思潮中，又有不同的思潮同时存在，故亦不排斥乾嘉时的考据学思潮。

<sup>②</sup> 《六书论序》，《戴震文集》卷3，第66页。

<sup>③</sup> 《大戴礼·保傅》：“及太子少长，知妃色，则入于小学。”注：“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，十五岁入太学也。”周代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，十五岁入太学。小学教授六艺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都要学。汉代，以文字训诂之学为小学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收小学十家，都是训诂和字书。《汉书》卷85《杜邺传》颜师古注：“小学，谓文字之学也。”隋唐以后，小学类书籍，分为训诂学、文字学、音韵学三类。

<sup>④</sup> 《六书论序》，《戴震文集》卷3，第66页。六书戴震依《说文》；刘歆、班固为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；郑众称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处事、假借、浩声。

中论转注举之。《尔雅·释诂》有多至四十字共一义，其六书转注之法欤？”<sup>①</sup>

戴震自以为，转注之为互训，是直探六书原旨的结果，恢复了两千年来已失传的绝学。这是他十余年存心拳拳研究的收获。对于戴震的这个主张，历来众说纷纭。有是之，有疑之，有非之。陆宗达说：“戴震、段玉裁以互训为转注，其说虽有功于同义词、字的研究，简捷易晓，但与造字六书无关。”<sup>②</sup>既肯定其贡献，又指出其不足。马叙伦说：“按前人有谓转注者，一义数字也，其说近矣。然戴震、段玉裁之流，遂以后世训诂视转注。”<sup>③</sup>主张转注为造字之法，与戴震以转注为用字之法大异，所以，马叙伦非转注就是互训说。六书之转注，可视为孳乳造字法，互训是用字法。前者为文字学，后者为训诂学，两者有异，但戴震对于小学的功绩，应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
许慎《说文》以来，训诂取“因形求义”法，戴震标新立异，主张“因声求义”法。25岁（1747）撰成《转语》二十章，以分别××两字的“音同”、“音近”、“音转”的声义关系。所谓“因声求义”，是指“名从乎声，以原其义”<sup>④</sup>的意思。其根据是“人之语言万变，而声气之微，有自然之节限。是故六书依声托事，假借相禅，其用互博，操之至约也”<sup>⑤</sup>，所以提出“转语”说。“转语”是指从声母发音部位和清浊，把三十六声纽按照声母体系分为五类四位，或按韵母体系把古音分为九类二十五部。“转语”方法分声转和韵转两类，声转而义可通，便具有假借的功能，因假借原于声，与形无关。每一个小韵都是表音的音节，也是表义的单词。因此，韵转与声转一样，由声韵而求本字意义。戴震认为，声转分正转和变转两类。“凡同位为正转，位同为变转”<sup>⑥</sup>。所谓“正转”，是指声母表的喉、舌、腭、齿、唇五类的类内相转，即每类内各声母所属的字互相转变，譬如喉、类、见、溪等七个声母两两互转。所谓“变转”，是指声母表的四位的每一位内部的声母互相转变，即位内的相转。譬如第一位的见、端、知、照、精、帮六个声母，这六个声母的知母与精

① 《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》，《戴震文集》卷3，第64页。

② 陆宗达：《说文解字通论》。

③ 马叙伦：《说文解字研究法》。

④ 戴震：《转语二十章序》，《戴震文集》卷4，第91页。

⑤ 戴震：《转语二十章序》，《戴震文集》卷4，第91页。

⑥ 戴震：《转语二十章序》，《戴震文集》卷4，第91页。